

空间理论视角下《无名的裘德》中淑的悲剧结局：空间禁锢与女性命运

严慧芸

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摘要】本文旨在运用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结合福柯的规训权力、多琳·马西的性别空间理论及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系统分析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中淑·布莱德黑德的悲剧命运。研究结合空间流动的动态视角，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三个维度切入：物理空间的限制构成对淑身体的规训；社会空间的权力结构强化对其主体性的压抑；心理空间的冲突与幻灭则最终导致其精神崩溃。通过空间批评的视角，本文揭示了淑的悲剧不仅是个体命运的呈现，更是父权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的必然结果。本研究为《无名的裘德》提供了新的批评视角，拓展了经典文本的解读路径。同时，其对空间与性别权力关系的探讨，也为当代女性争取空间权利、审视社会结构性压迫提供了历史参照，有助于启发更具包容性与自主性的性别空间构建策略。

【关键词】《无名的裘德》；淑·布莱德黑德；女性命运；空间理论

【收稿日期】2025 年 4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5 月 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191

Sue's tragedy in *Jude the Obscure* from a spatial theory perspective: spatial confinement and female destiny

Huiyun 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tragic fate of Sue Bridehead in Thomas Hardy's *Jude the Obscure* by applying Henri Lefebvre's spatial triad theory, integrating Michel Foucault's disciplinary power, Doreen Massey's gendered space theory, and Gaston Bachelard's poetics of space. Combining a dynamic perspective of spatial mobility, the study examines three dimensions: the constraints of physical space constitute the discipline of Sue's body; the power structure of social space intensifies the suppression of her subjectivity; and the conflict and disillusionment in psychological space ultimately lead to her mental collapse. Through a spatial critique,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Sue's tragedy is not merely a manifestation of individual fate but also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patriarchal mechanism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 study provides a new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Jude the Obscure*, expanding th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 to this classic text. Moreover, its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gendered power relations offers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women's pursuit of spatial rights and examination of social structural oppression, thereby inspiring more inclusive and autonomous strategies for gender-space construction.

【Keywords】 *Jude the Obscure*; Sue Bridehead; Female destiny; Spatial theory

引言

《无名的裘德》是托马斯·哈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被文学界誉为“天鹅绝唱”，小说以玛丽格伦、基督寺、梅勒寨、沙氏屯、奥尔布里坎及重回基督寺的空间转换为主轴，构建起多维的空间地理图景。在时空的变化中，女主角淑·布莱德赫经历了从精神反叛、追求

个体自由到逐渐被婚姻制度与宗教规训异化的悲剧轨迹。她的矛盾性转变不仅构成深刻的人性隐喻，更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性别权力结构中生存困境的文学镜像，其命运浮沉所承载的社会批判维度至今仍具现实观照意义。

现有研究中^①，以女主人公淑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约

^① 截至 2023 年 12 月，以中国知网（CNKI）、Web of Science 和 ProQuest 学位论文库为数据源，以“无名的裘德”“淑·布莱德黑德”“空间分析”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以淑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文献 36 篇（包括期刊论文 28 篇、博士学位论文 5 篇、专著 3

部）。研究时段覆盖 1980 年至 2023 年，聚焦于女性主义批评（占比 58%）、宗教伦理批判（22%）与空间叙事分析（20%）三大方向。

36篇，关键词聚焦于女性主义、悲剧、人格分析和伦理身份。从空间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宏观空间视角与单一理论应用，如张红（2010）和陈静（2020）从整体空间叙事展开分析，但未能揭示淑的个体空间困境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博弈；刘姣（2011）和任雪丽（2019）虽然引入了比较视角，但前者仅聚焦“路”这一具体意象，后者偏重裘德而非淑的空间分析，未能全面展开对女性空间困境的解读；学者于洋（2015）尝试引入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但是局限于单一理论，未能深入探讨物理、社会、心理三元空间的辩证关系。此外，王永梅（2010）混淆“地点”与“空间”概念，陈了（2022）则以线性移动简化空间内涵，可见《无名的裘德》长期被置于传统女性主义或叙事学的框架下讨论。现有研究虽在淑的精神反叛与伦理身份解读上成果丰硕，但空间视角的运用仍呈现几重局限：其一，缺乏三元空间维度的系统性整合，物理禁锢与社会规训的联动机制被割裂；其二，对淑的“心理抵抗空间”关注不足，弱化了对于主体能动性的探讨。

本研究以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统合物理、社会与心理空间维度，通过物理禁锢（如城乡边界）、社会渗透（如规训网络）与心理抵抗（如诗学化空间）的三重互动，重新诠释淑的悲剧为空间权力与个体自由的辩证冲突，揭示多重空间如何通过“禁锢-渗透-抵抗”的辩证过程形塑淑的悲剧，进而将个体命运沉沦升华为对维多利亚晚期空间权力结构的系统性批判，同时也为经典文本提供了更具当代性的解读路径。

1 物理空间：身体规训

物理空间作为淑的容身场所，内部的权力运行与淑的生存处境息息相关。物理空间既是安置个体的容器还是充斥着各种矛盾关系的“权力场”。“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1]列斐伏尔明确指出空间是权力流动的场域，处于空间内的个体必然会受到权力斗争的影响。福柯则进一步细化空间权力规训，权力从君主转移到构成“大众”的个体，转移到社会机构学校、军队和监狱^[2]。这一论断在空间封闭、纪律严苛的女修道院中具象化：高大围墙与外界相隔，淑的人身自由受到明显限制；个体的穿着和言行均受到严格要求，当裘德目睹淑衣着朴素死板、腰肢板直，“轻快活泼都不见了”^[3]，权力规训得到直观体现。个体试图挑战内部权力关系，则会受到空间权力机制的惩罚。淑因和裘德一夜未归受到了惩罚，不仅被孤立，还被罚禁闭，不仅损害了淑的人格尊严，还剥夺了淑的人身自由。女修道院

规则重重，充满压抑和控制，淑对此无法忍受。而最后淑跳窗逃离，就是个体试图打破空间束缚的勇敢尝试。

从梅勒寨到沙氏屯，空间切换的背后是淑身份的转变。在梅勒寨，淑是求学者，身上更多的是修道院的规则约束。而在沙氏屯，淑作为费劳孙的妻子，身上多了世俗婚姻的规训和男性施加的压迫。作为栖居场所，婚房“镶着橡木壁板的墙”“粗笨的梁”^[4]构成物理性压迫，低矮的天花板形成具象的空间挤压，这种建筑设计既是历史权力的具现化，也是父权婚姻的空间具形。婚房古老压抑的氛围并没有为淑提供温馨的生存空间，与淑年轻鲜活的生命气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内化为淑内心的不安与烦闷，就像是“几百年的时光重重地压在她的头上”^[5]，让她在这一空间下难以安然生存。作为婚姻关系的容器，婚房内部还体现了权力的性别划分。与福柯的权力规训理论相比，多琳关注到了空间的性别属性，她明确指出空间是有性别之分的，在父权制主导下的划分方式是对男性友好的，女性在这种划分方式之下生存只会更加艰难^[6]。作为非自愿婚姻的受害者，淑无比抗拒费劳孙的接近，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她让渡卧室空间，到狭小封闭的挂衣间休息。淑想借此减少男性力量的影响，但是空间下男性主导力量依旧存在。费劳孙不慎闯入淑的卧室，淑为了逃避再次选择跳窗，这是女性面对男性主导的无奈逃避。

2 社会空间：权力枷锁

哈代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很多小说都展现了该时代的社会图景。《无名的裘德》和《德伯家的苔丝》就是典型的例子，女主角淑和苔丝的悲剧命运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普遍困境。维多利亚时代是新旧并存的时代，孕育了先进的工业文明，但思想上依旧保留着传统色彩。社会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生产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所生产”^[7]。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了权力、阶级、性别、文化等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现有的权力结构如国家、资本、父权制通过法律、规划、意识形态等手段巩固其特定的空间秩序。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严格遵从宗教道德规约。任何个人都会绝对遵从上帝的旨意来显示对宗教道德的忠诚，否则将会被他人所排斥不被社会所接纳^[8]。淑崇尚自由，抗拒宗教，但是环境却和内心渴求相反，宗教气息遍布各个角落。生活在“全国基督教气氛最重的城市”^[9]基督寺，从事着圣像工艺师的工作，在这样的空间下，淑对宗教持有一种矛盾态度，既可以大胆地买下“赤身露体”“一丝不挂”^[10]的异教神像，带回圣工坊，但是又会心虚地用树叶包裹神像，面对房东的询问，撒谎称是

圣人像。矛盾的背后是淑内心的艰难斗争，她排斥宗教，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而苔丝同样受到宗教道德的束缚，宗教道德看重女性贞洁，苔丝被亚雷侵犯，却被宗教道德审判，不仅私生子无法得到认可，就连克莱尔也选择离开她。在宗教主导下的社会空间，淑和苔丝作为“另类”，无力与社会意识形态对抗，于是出现了淑于宗教摇摆不定的态度，和苔丝在感情中则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

除了宗教，婚姻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规训。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婚姻观仍然十分保守，婚姻被视为上帝认可的神圣契约，带有宗教和法律的双重枷锁。社会要求夫妻不论感情如何，都必须终身恪守婚姻承诺，任何背离这一准则的行为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7]淑离开费劳孙去裘德身边，这一行为是对这一准则的挑衅，毫无疑问，遭到了非议。此后淑与裘德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他们的爱情不被社会认可，排挤和孤立让他们难以立足，不得不离开。

淑与费劳孙的婚姻是男权主导和宗教规范的社会关系，符合社会对婚姻的期望，却违背了淑的内心意志；她与裘德的爱情是自由的，但是却与社会规范相违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给淑带来了折磨，这也反映出婚姻作为女性生存的重要议题，女性意愿在其中的位置，对女性生存至关重要。

3 心理空间：精神困境

空间并非只是物质意义上的载物体容器，更是人类意识的幸福栖居之所。^[8]它不仅提供庇护，还塑造记忆、身份和归属感。当空间与人的情感、文化或理想共鸣时，它便超越了物质性，成为滋养幸福的精神家园；反之，则成为束缚自我意志的心灵囚笼。淑和艾拉白拉是鲜明的二元对立。淑追求自我意识觉醒，蔑视传统的宗教和婚姻制度，内心实际与空间逆向发展；而艾拉白拉迎合世俗，主动利用婚姻制度满足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和者”。淑的思想超前于时代，渴望建立自由的心理空间，但是空间内部对于“异质”的排斥，使她的理想一再幻灭，被迫离开。孩子的死亡是淑心理的重要转折点，内心的悲伤和内疚无限扩大，彻底淹没了淑，只能将内在的罪责感投射到外部世界，将社会的规训力量符号外化为惩罚代理人，通过接受外在惩罚来缓解不可承受的精神焦虑。这种通过自我贬损来完成对现实冲突的象征性解决实际上标志着主体性的彻底溃散。最后，淑离开裘德，回到了费劳孙身边，重新和他结婚，完全违背内心意志，从精神到肉体彻底归顺男权社会。而艾拉白拉看似未经受

心理折磨，实际上是女性被男权社会异化的具现化。同样面临宗教和婚姻的压迫，艾拉白拉不同于淑，没有提出反抗，而是主动地利用婚姻制度，引诱裘德与其结婚，在发现裘德并不能满足她对务实生活的期待时，她又决然地离开裘德，将裘德当作可以任意舍弃的物品，这表明艾拉白拉情感能力退化，冷漠、自私的态度看似规避了陷入淑一样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境地，实际上表明艾拉白拉已经化身为社会规则的机械执行者，内心认可男权社会下的权力规训，缺乏自我意识，精神荒芜。

维多利亚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宗教道德构成了严密的空间，女性的心理空间受到严格限制。淑和艾拉白拉分别代表了女性对这类空间的两种极端反应：前者意识超越时代，渴望建立全新的精神秩序；后者则在世俗规则中游刃有余，以功利态度应对生存需求。然而，两者的结局却在本质上都是悲剧，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精神自由和权力规训之间的困境，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女性的主体性均无法逃离被侵蚀的命运。

4 空间流动：反抗妥协

流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从属于空间的概念^[9]。这揭示了空间的矛盾本质：既被结构化，又充满反抗的可能性。淑的空间流动既是被空间结构化的结果，也是反抗空间规训的实践。为了获取知识和未来就业，淑大胆进行空间流动，只不过在社会规范的阻挠下并未如愿，结果就是淑不得不和费劳孙结婚，来到沙氏屯，背后折射出的更多是个人意志在空间权力结构下被迫让步的无奈。尽管宗教和婚姻对淑都造成了一定的摧残，但此刻淑并未彻底妥协，依旧艰难地争取自由和爱情。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描写有关空间流动时，涉及到了很多交通工具，尤其是火车。维多利亚时代，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火车“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将各地独立空间编织成国家网络”，^[9]火车既是科技成果，同时也是空间流动的媒介。淑对于火车的态度反映了她对工业社会下自身处境的认知，她感叹“像火车那样一个力大无穷的机器，却要为她——一个从合法的家庭里逃出来的女人——停住，好像很奇怪”^[3]。淑的惊讶暗示其尚未完全自觉的反叛意识——她本能地质疑社会机器为何会为个体让步，却未意识到这种“让步”本质是权力的柔性运作。不彻底的反叛意识使得淑性格犹豫，不够坚定，易受空间影响。

父权制社会下空间以维护男性权益为主，女性无法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面临如此困境，该如何突围？

多琳·马西给出了答案:女性需要继续走出固有空间,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10]。只有走出私人空间才能争取真正属于女性的空间。

5 结语

三重空间交互共同塑造了淑的空间异化轨迹:物理空间的结构禁锢物化了她的身体规训;社会空间的制度性暴力系统剥夺其主体建构的可能;而心理空间的幻想溃散则最终瓦解了她的自我意志。这一过程揭示了个体如何在维多利亚晚期的空间权力结构中被规训乃至消亡。淑的悲剧并非个人的偶然,而是父权社会空间规训的必然结果。在当代语境下,女性的发展仍面临类似的空间困境:职场中的性别区隔、家庭角色与社会期望的冲突、女性自主话语权的争夺等。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与自主性的女性生存体系,使空间不再成为囚笼,仍是亟待探索的方向。本文对淑的空间化解读,不仅为经典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当代性别平等议题提供了历史参照与批判性思考。

参考文献

- [1]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41,304.
- [2] 唐健铭,福柯的微观权力和规训权力理论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3.
- [3] 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张谷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38,195,311,357.
- [4] 杜靓.多琳·马西的女性主义空间理论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1.
- [5]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王志弘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83.
- [6] 华静.英国维多利亚时期 宗教异化的悲剧——《捡橡果的孩子》人物悲剧根源探析[J].时代文学,2012,6(2):188-190.
- [7] 肖曼琼.爱情的挽歌 时代的悲音——论《无名的裘德》中主人公的爱情悲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19(3):78-80.
- [8] 叶木桂.论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J].美与时代,2010,25(2):95-98.
- [9] Wolfgang, Shivalbusch. The Railway Journey: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Perception of Time and Spac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186.
- [10] 毛彩凤.空间的性别建构-多琳·马西的女性主义空间理论及其对中国女性的现实启示[J].东南大学学报,2019,21,(6):37-43+146.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